



# 王力译文集

(二)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 王力译文集 (二)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 娜 娜

[法]左拉 著

# 目 录

左拉与自然主义..... 429

正文 ..... 441

附录 ..... 829

# 左拉与自然主义

## 一 左拉之身世与其著作概述

左拉(Émile Zola)以1840年生于巴黎。他的母亲虽是法国人,他的父亲却是意大利的梵尼斯(Venise)人,祖母是希腊人。他的童年期与青年期是在勃罗旺斯省(Provence)度过的。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坏,以致考不得学位,所以只好做些小小的差事。他在巴黎与外省的许多报馆里办过事,也曾写过些浪漫派的小说,例如《宁农的故事》(Les Contes à Ninon);后来又写了些风俗小说,比较地更好些,例如《黛列思拉根》(Thérèse Raquin, 1867),与《玛玳琰·费拉》(Madeleine Féral, 1868)。

然而他的大著作《罗恭玛嘉尔家史》(Les Rougon Macquart)却在1871年才开始。本书原名《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的而且与社会有关的历史》(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共分二十卷:一,《罗恭的家运》(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二,《饿鹰》(La Curée, 1872);三,《巴黎之腹》(Le Ventre de Paris, 1873);四,《伯拉桑的战利品》(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1874);五,《漠烈院长的过失》(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1875);六,《虞仁罗恭老爷》(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七,《屠槌》(L'Assommoir, 1877);八,《爱情之一页》(Une Page D'Amour, 1878);九,《娜娜》(Nana, 1880);十,《家常便饭》(Pot-

Bouille, 1882); 十一,《托女人的福》(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十二,《生活的快乐》(La Joie de Vivre, 1884); 十三,《共和历七月》(Germinal, 1885); 十四,《成绩》(L'oeuvre, 1886); 十五,《土地》(La Terre, 1887); 十六,《梦》(Le Rêve, 1888); 十七,《人中禽兽》(La Bête humaine, 1890); 十八,《金钱》(L'Argent, 1891); 十九,《破产》(La Débâcle, 1892); 二十,《巴斯嘉尔博士》(Le Docteur Pascal, 1893)。其中最著名的四卷乃是《屠槌》,叙述工人的生活;《娜娜》,叙述淫佚的生活;《共和历七月》,叙述矿工的生活;《破产》,叙述战争的生活。

自 1879 至 1882 之间,他为自然主义做了许多论文,例如《实验的小说》(Le Roman expérimental, 1880)、《自然主义与戏剧》(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 1881)等。后来他又从事于宗教的描写,著《三大名城》(Les Trois Villes): 一,《卢尔德》(Lourdes, 1894); 二,《罗马》(Rome, 1895); 三,《巴黎》。这三部小说都是叙述宗教不能救人民的痛苦的。最后他又从事于社会主义的描写,著《四福音书》(Quatre Evangiles), 只成三部: 一,《富饶》(Fécondité, 1899); 二,《工作》(Travail, 1901); 三,《真理》(Vérité, 1903)。他曾经是最热烈的共和党,后来又是社会党,甚至于是共产党。1889 年,狄烈夫大尉卖国事件起,他与法朗士(Anatole France)同冒大不韪,竭力替狄烈夫辩护。他在《曙光报》(L'Aurore)上登了许多激烈的文字,曾经被捕下狱。1902 年为煤气所毒,死于巴黎。死后六年,即 1908 年春间,改葬于班迪安(Panthéon)国葬院。

## 二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在左拉以前,文学界但有所谓现实主义(Réalisme),无所谓自然主义(Naturalisme)。说到现实主义的先锋,要算是巴尔扎克(Balzac, 1799—1850)。泰耐(Taine, 1828—1893)说他摹写真相,把卑劣的事情描写得比其他的事情更生动些。泰耐自己也是现实

主义的中坚。此后有杜兰第(Duranty)在1856年著《现实主义》,庄佛乐利(Champfleury)在1857年著《现实主义》,同年,佛罗贝尔(Flaubert, 1821—1880)的小说《波华丽夫人》(Madame Bovary)出版。佛罗贝尔号称现实主义者,然而杜兰第怪他专从事于美术方面,却没有感觉,而且是干枯的。与佛罗贝尔同时的现实主义者还有龚果尔兄弟(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他们在《姑美尼拉赛陀》(Germinie Lacerteux, 1864)的序文里说:

民众喜欢假的小说,这却是一部真的小说。民众喜欢走到上流社会里去的书,这却是一部从马路上来的书。民众喜欢淫邪的作品、娼妓的日记、床头的供状、恋爱的秘史,然而这一本书却是庄重的、纯洁的。我劝民众开卷时,切勿希望书中有娱乐的描写,这书只是爱情的医院。

民众喜欢缓和剂与安眠药,他们要靠团圆结局的故事来帮助他们的消化;这书悲哀而且激烈,违反他们的习惯,有碍他们的卫生。

那么,为什么我们写了这一部书呢?为的是得罪民众,故意干犯他们的嗜好吗?

不是的。

生于19世纪,在平等自由的时代,我们常常自问:所谓“下级社会”有没有入小说的权利?直到现在,文学家不屑描写平民,他们有心灵不能发泄,是否应该长此不变?下级社会的痛苦,是否值得写?是否值得读?小人们、穷百姓们,在痛苦的时候,能否像受痛苦的大人们、富贵的人们一般地惹人咏叹?总之,下级社会的眼泪能否像上流社会的眼泪一般地令人痛哭起来?

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写了这一部书。

依龚果尔诸人的论调,现实主义在乎描写下级社会,把平民的

痛苦宣泄出来。自然主义,在字面上说起来,与现实主义没有什么分别,因为都是“描写实在”的意思。然而左拉却在他所著的《实验小说论》里替自然主义立了一个定义说:

自然主义是由新科学施用到文学上的一种程式。

左拉的同志黑斯曼(J.K.Huysmans,1848—1907)更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切实地说明。他在《眉批》(En Marge)里批评左拉的《屠槌》,同时把这两种名称加以解释说: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个名词,被人们加以种种不同的定义,我们应该切实地说明。有些人说,——而且是最动听的论调——现实主义者所选的题材乃是最丑恶的、最粗鄙的,他们的描写乃是最淫褻的、最能令人作呕的。总而言之,乃是把社会的疮疥尽情披露出来。自然主义者把社会的疮疥的绷带揭开之后,只有一个目的,便是教人们测量那可怕的疮口有多深。

其实我们并不管它是疮疥呢还是粉红的肌肤。我们固然把疮疥描写,也未尝不把粉红的肌肤描写。因为疮疥与粉红的肌肤都是存在世上的。最卑污的人与最高尚的人一般地值得研究,娼妓荡妇们到处都有,与正气的女人们一般地享有公民的权利。社会是有两方面的,我们把两方面都描写给人们看。我们把画板上的一切的颜色都拿来应用,并非专用黑色,不用蓝色;我们无分别地赞赏李比拉与华陀<sup>①</sup>,因为他们都有好笔法,所画的东西都非常生动!人家虽则说我们专爱描写丑恶,其实我们并非只喜欢淫邪而不喜欢贞操,只喜欢放浪而不喜欢廉耻;我们一样地赞赏酸辣的小说与甜脆的小说,只要著者以观察所得把实地的生活描写下来,就是好书了。

① 李比拉(Ribéra,1588—1656)是西班牙的画家,是现实主义派;华陀(Watteau,1684—1721)是法国的画家,爱画乡村风景。

我们并不是些宗教党徒,我们相信文学家应该像一个画家,是要适应潮流的,我们要把古时的宽衣长剑付之东流。近代所谓名著,甚至令我们心中作呕,然而我们并不推翻了他们的书,也不捣毁了他们的偶像,我们只在他们的旁边。我们到马路上去,也像到了王宫;我们到荒野去,也像到了有名的树林。我们努力想要不像浪漫派描写那些超越自然的美事,不像他们去找乌托邦的幻影。我们要把那些有骨有肉,能生活能走动的人类的真相摆在人们的眼前。我们在某一个环境里观察了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于是把他们的生活很用心地、很详细地描写。他们的贞操或淫邪、恋爱或仇恨、一时的冲动或永久的德性,都显现在我们的笔端。我们好像给人们参观野兽的人,不论那些野兽快乐或悲哀,我们只给人们看清楚就是了!

平常的小说总有一个结局,或用婚姻收场,或用死亡收场,我们的小说却不一定有结局。是的,不错。我们的小说不宣传什么学理,往往是没有结论的。是的,也不错。

但是,艺术是与政治上的学理或社会上的空想没有关系的。一部小说并不是一个讲坛,也不是一个教座,我以为艺术家应该避免这种无用的浮词。

我对于众人所沿用的程式,更要明白地反对了。

依我的意见,自古至今的文学家只描写些例外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那些小说家与诗人所叙的爱情,或因此自杀,或因此杀人,或因此发狂,都只是些特别的情形。这些特别的情形,被文学家观察到了,记载下来,我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事实俱在。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的生活,人人所过的生活,天天所过的生活,值不得研究,因为平淡无奇,引不起人们的兴味与热情,比不上凭空造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或一件惊人的事情,我却觉得这一种话没有道理。譬如某人的妻子死了,他哭

了一场,后来再娶一个妇人,而且并没有什么懊悔。老实说,我觉得这男子与维特一样伟大<sup>①</sup>,一样值得记载;维特这呆子,快活的时候就咀嚼奥相的诗,悲哀的时候就为罗洛德而自杀,为什么只有他值得记载呢?

我们的小说以分析代替幻想,情节并不怎样复杂,所以弄到读者吃惊地叫道:“呸!没有一点儿事情,何苦枉费笔墨!”唉!现在的时代,不像当初人们赞赏大仲马、轻视巴尔扎克的年代了!民众已经讨厌才子佳人的作品了!

是的,民众趋向强烈的作品了。《屠槌》的成功,就是一个证据。唉!我晓得有许多村学究很失望地嚷道:“我们想要些干净的而且能安慰人的小说;生活已经是悲哀的了,何苦把它的真面目给我们看呢?请你们像狄更司(Dickens)一样吧,他也是描写下流社会的,然而他把干净的事实博取民众的娱乐,同时顾及道德方面,岂不比你们强吗?”

唉!我一听到这种话就令我生气了!艺术并不是拿来娱乐那些低着头咬着手指的小姐们的,也不能像狄更司的作品供给家人团聚时的谈话资料或给养病的人们消遣。我老实说,高声地说:干净与不干净,与艺术毫无关系。不会做小说的人才把不干净的事实写成淫书!

我再说一句,凡是写实的、生动的作品,非但不至于有伤风化,而且想要不寓劝戒之意也还是一件难事呢!淫邪的本身就生出刑罚来,浪荡的自然的结局所给予的惩戒要比法律所定的惩戒更严。所以写实的小说就是有益于风化的好书。末了,我总结一句,自然主义乃是对于存在的人物的研究,而所研究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所得的结果;依左拉先生自己的说法,凡对于真相很有耐心地研究,从最细微的地方观

① 见哥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

察,便是自然主义了。

黑斯曼对于自然主义的解释很是透彻,然而左拉乃是自然主义的首领,我们且看他为主义而奋斗的经过。

### 三 左拉与自然主义

**左拉的思想与其方法之由来** 左拉的文学方法有一部分受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佛罗贝尔、龚果尔兄弟的小说的影响,同时又与泰耐的哲学有关系。现实主义派已经说新时代的小说不该是浪漫的了;小说不该是捏造的奇谈,甚至于不是消遣的资料,只该是对于事实很确切的描写。但是左拉读了达尔文与泰耐的书,觉得自己可以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所以他主张“实验”的小说,要把文学与科学合化,用解剖的方法表现真相。恰好那时的著名的生理学大家克罗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于1865年著《实验医学绪论》一书,名医律嘉(Prosper Lucas)于1847至1850年著《自然的遗传》一书,名医洛图尔诺(Ch. Letourneau)又于1868年著《情感与生理》。这三部书都给左拉一个很大的影响。他觉得古来的所谓名家小说都是些没有经验的作品。因为人类的一切都与生理的组织有关系,所以小说里的一切也都与生理的组织有关系,而古来的文学家竟忽略了这一点。小说是描写人类的“气质”的,而气质乃是两种必然的结果:遗传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所以左拉的《罗恭玛嘉尔家史》可以说完全是关于遗传与环境的描写。在这一部大著作以前他曾经著《玛玳璠·费拉》一部小说,又主编《讲坛报》,宣传他的自然主义,因此曾受政府的干涉。

**政府的干涉** 当左拉初发表《玛玳璠·费拉》的时候,赛纳公安局以为这小说里有过于大胆的描写,请他删改其中的几段。那发行者赖克鲁华已经表示愿意删改了,他却不肯,他以为政府对于文学上的道德观念是不对的,于是生气地说:

“怎么!市面上许多没有经验的小说,用所谓风流的雅笔去捏

造许多淫邪的事情,却不被干涉;现在我用严厉的手腕去揭露社会的伤痕,人家反来攻击我!……”

《讲坛报》也于1876年9月被政府检去,说这是“侮辱天主教”的报纸。报馆的经理被监禁了三个月,又被罚了四千法郎。律师说这报纸乃是鼓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而且是反对宗教的,说他们每天在前两页里专讨论社会上的问题。

他虽则受政府的干涉与旧派的反对,然而新文化的潮流所趋,竟令他的《罗恭玛嘉尔家史》第七卷《屠槌》大告成功,惊动一时。今将《罗恭玛嘉尔家史》略述如下:

《罗恭玛嘉尔家史》左拉依照“遗传的规律”做他的小说,所以先立一个谱系。全书所叙及的罗恭家的子孙共三十二人,与此家有关系的共约一千二百人。后来拉蒙把这些人物都列成图表,附于全书之末。本书第一卷《罗恭的家运》叙述罗恭娶某妇人为妻。罗恭是强健的人,然而他的妻子是有神经病的,她的情郎玛嘉尔又是中了酒毒的。以后诸卷便分叙正式夫妇所生的子孙一支,与玛嘉尔私生的子孙一支。这两支子孙表现种种遗传的结果。其中也有几个身心健全的人,例如《生活的快乐》里的宝莲、《巴斯嘉尔博士》里的克罗第尔德与巴斯嘉尔,但是以中酒毒的、生肺病的、歇斯底里病的、神经病的、疯狂的、卖淫的、犯法的居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卑污放浪的人。左拉研究这种环境的时候,的确费了一番苦工夫。为了《屠槌》,他去参观了许多酒徒聚饮的地方,马路上、酒店里、跳舞场里、洗衣场里,都有他的足迹。许多工男工女的一举一动都上了他的笔记,而且绘了许多房屋与市区的地图。他每做一部小说都是这样去找事实的,所以上流社会里、大商店里、宗教的地方,也是他常到的地方。自从《屠槌》出版之后,文学界的人无论反对或赞成,都认为是一件惊人的大事。

**器俄的意见** 当时器俄的朋友巴尔布(Barbou)对器俄说左拉这一本《屠槌》乃是“有用意”的作品,而且竭力描写酒毒的危险,于

社会上不为无功。器俄说：

“您的话不错，然而《屠槌》到底是一部不好的书，他把社会的丑恶都披露了，竟像他以此为乐事似的！下流人都爱读这种书，所以他能够成功。”

“先生”，巴尔布说，“这书的作者先叙述一对善良的夫妇，他们很有秩序，很知俭约，因此很幸福。后来他叙述一个懒惰的酒鬼做了许多卑污的事，受了许多苦楚，正可以形容善良的人，为什么您责备得这样严呢？”

“这个我不管”，器俄说，“他这种描写乃是不应该的。不错，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自己也到过穷苦凄凉的地方，但是我不愿意人家描写成为小说。我们没有把不幸的事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权利。”

器俄也知道有些自然主义者说他的《哀史》里有些地方也是很大胆的描写，于是他自己解释说：

我在《哀史》里，不怕把一些痛苦与羞耻的事情披露出来。我叙述了一个罪犯与一个妓女，然而当我写的时候，时时希望把他们在卑污的生活里打救出来。我混进这苦恼的社会里去，为的是医治他们。我混进去的时候，自命为宣传道德者，为医生（其实左拉的理论也是如此），然而我不愿意人家袖手旁观，毫不关心，只像看戏似的！

像器俄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赞成他的人也不少。我要在下面叙述他的同志与他的弟子们。

**被喝倒彩的作家聚餐会** 1865年，左拉在里昂的《民众的救星》里做了一篇文章称赞龚果尔兄弟的《姑美尼拉赛陀》，龚氏兄弟十分感动，写了一封信去谢他，又于那一年年终请他到他们家里吃饭，这是他与龚氏兄弟初次的认识。后一年，他又谒见佛罗贝尔。后来他们常常来往。自1874至1880年，有所谓佛罗贝尔聚餐会，亦称“被喝倒彩的作家”聚餐会。会员五人，即：佛罗贝尔、屠格涅夫(Ivan Tourgueneff)、爱特蒙·龚果尔(时爱特蒙之弟余勒已死)、

杜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左拉。

这一种集会当然对于自然主义的宣传很有裨益,尤其是屠格涅夫对于左拉的帮助很大。当左拉在法国大受攻击、各报馆与杂志社都拒绝登载他的文章的时候,屠格涅夫把他的作品介绍到《莫斯科日报》与《欧罗巴消息》里发表。因此俄国的人都知道左拉。

有一次,在聚餐的时候,佛罗贝尔反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的旗帜,说这是空泛的名词。左拉说:

我也像您一般地瞧不起自然主义这名词,然而我偏要到处宣传,因为凡事总要有个名称,好教民众相信是新的。

被喝倒彩的作家聚餐会之后,有

**达拉家聚餐会** 1877年,佛罗贝尔、龚果尔、左拉、黑斯曼、莫泊桑(Maupassant, 1850—1893)、赛亚尔(Céard, 1851—1924)、安尼克(Hennique, 1852—)、阿列克西(Alexis, 1847—1901)、米尔波(Octave Mirbeau, 1848—1917)九人在达拉店家聚餐。那时各报馆都说这是宣传左拉的自然主义的集会。然而这里头还有佛罗贝尔与龚果尔是左拉的前辈,至于后来的麦潭社,几乎可以说是左拉的晚辈或弟子了。

**麦潭社** 左拉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有组织会社的志愿,他在1860年给巴埃(Baille)的信里说:

您与赛山,我与巴佐,我们四个便可以做创始人。我们将来要很严格地容纳新社员……我们每周开会一次,每次把一礼拜内各人所得的新思想互相报告。我们固然要谈科学,然而我们以艺术为我们的谈话里的大问题……

他这计划不能实现,然而到了他成名之后,在巴黎联络一班朋友与弟子,常常到他的家里开会。1877年以后,他在巴黎附近的麦潭赁了一所屋子,他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那边住的,他的弟子们都到那边集会,所以号称麦潭社。他们在1880年出了一部杂

志,名为《麦潭夜话》(Les Soirées de Médan),撰稿人是左拉、莫泊桑、黑斯曼、赛亚尔、安尼克、阿列克西。

左拉本是自然主义的勇猛的先锋,由他打开了一条血路,他的同志才跟他进攻。然而自从他成功之后,连同志们都妒忌他了,于是有

**五人的宣言** 1887年,左拉的《罗恭玛嘉尔家史》第十五卷《土地》出版,班纳丹(Bonnetain)、罗尼(Rosny)、狄卡夫(Descaves)、保罗·马克利得(Paul Marguerette)、基歇(Gustave Guiches)五人联名宣言反对。他们说:

左拉自从著了《屠槌》之后,我们看见他那样刚强勇敢,可以补救现在的文学界的懦弱的毛病,所以我们爱他,就是爱他的勇气。谁料《屠槌》出版不久,他便做错了些事情……我们还希望他的《土地》出版之后可以慰我们的热望,现在竟令我们失望了!非但他的观察是不着实的,非但他的描写是平庸而欠个性的,而且他的笔墨的淫秽竟达了极点,有时候竟令人疑是一部诲淫的书。唉!我们的大师竟到了卑污的地方去了!……

我们的抗议,并不是为什么仇恨的心理所驱使。我们巴不得这伟人安然地进行他的事业。……

有人说这一次的宣言是杜德与龚果尔指使的,这话虽则没有铁证,而杜德妒忌左拉却是实情。在勒纳尔(Jules Renard)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

杜德说:“文学的宗派乃是法国所特有的。假使我在左拉的铺子的前面另开一间铺子,另挂招牌,我一定更能成功。然而我们毫不在意地与他合股,以致今日的言论界竟是左拉的。一切的光荣都归了左拉。”

真的,一切的光荣都归了左拉!现在谈现代法国文学的人往

往从左拉说起,甚至于以 1871 年——《屠槌》出版之年——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替期间。

## 四 结 论

直到现在,法国的士大夫与村学究们没有不反对左拉的。他们的理由乃是:左拉的小说是肮脏的,尤其是给外国人看了之后,他们会对于法国的风俗有很坏的印象。他们不晓得怪社会肮脏,只晓得怪左拉的小说肮脏,譬如对镜的人不晓得自己肮脏,却怪那镜子里的影子肮脏!真是岂有此理!

又有人说左拉的小说也不完全是科学的:他自己在贫苦中出身,对于平民的描写,自然是千真万确;至于他对于贵族的描写,只靠几次访问,几场谈话,就有不科学的危险了。关于这一层我们也不必替左拉辩护,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势不能包办一切,我们只赞赏他的伟大的精神,崇拜他的主义,也就够了。

了一

二十年三月七日,巴黎

## 第一章

晚上九点钟的时候,陆离戏院里还在空着。楼上楼下,黯淡的灯光里,有几个人像疏星般散开在各椅子上等待。一片阴影笼住一块红色渍印似的戏幕,台上寂然无声,台前的列灯熄了,台下的乐谱架子空了;惟有三层楼上,在天花板上画着的许多裸体妇女与小孩们飞翔着的天空旁边,阔大的塑金的拱门底下,许多男女已经在那里了,男的戴着打鸟帽,女的戴着乡村小帽,唧唧喳喳,不住地说笑,不住地叫人。一个女招待不时出现,很忙,手里拿着戏票,推送着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坐下。男的穿着礼服,女的顾长而身体弯曲,正慢慢地四面张望。

楼下有两个少年人进来了,他们站着张望,其中有一个年纪大些,身体高大,嘴上有两撇小胡子的,向另一个嚷道:

“爱克多,我同你说的什么话来?你看,我们来得太早了。你本该让我从容地吸完了我的雪茄才是。”

一个女招待走过,用对待熟客的语气说:

“呀!福歇利先生,非到半个钟头以后是不会开演的。”

爱克多长而瘦的脸孔上现出不如意的样子,埋怨说: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广告上说是九点钟呢?克拉丽丝是个剧中人,她在今早还对我发誓,说一定在正九点开演哩。”

一会儿,他们住口了,抬起头向黑暗的包厢望去。院里的灯光还不很亮,那些包厢是用绿纸糊的,越发形容得黑暗了。楼下的包